

汪伪巨奸



江苏文史资料第48辑

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第4集

汪伪巨奸

蔡德金 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责任编辑 江君谟
编 审 吴志明

汪伪巨奸

蔡德金 著

(江苏文史资料第48辑)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发行

(南京长江路292号 邮编 210018)

南京体院印刷厂印刷 (1992年10月)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5 字数 220,000

国内统一刊号CN32—1287/K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9473

定价5.80元



汪精卫



陈公博



汪精卫、陈公博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二）

（1943年3月14日）



周 佛 海



周 佛海与日本签订借款契约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与各院、部、会人员合影。

前排右起：汪精卫、陈公博、梁鸿志、褚民谊、陈群、周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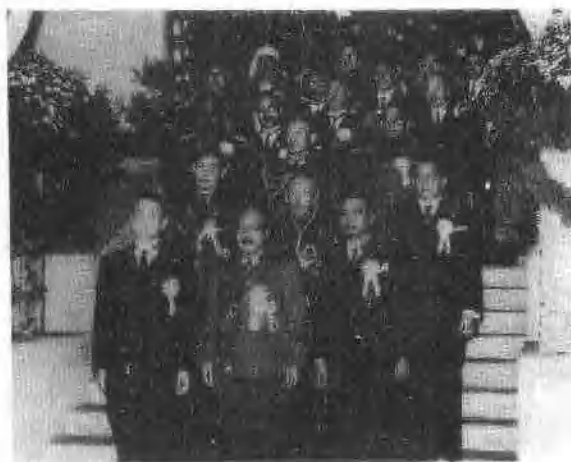
1940年4月24日 日本阿部特使来南京
庆贺汪伪政府还都典礼



汪伪召开东亚新闻记者大会



1942年1月12日，汪精卫会见
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



参加“大东亚会议”时的汪精卫
前左一：汪精卫。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

前 言

汪精卫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著名人物。

他一生复杂多变，早年追随孙中山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持《民报》，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论战，鞭辟入里的议论、明白晓畅的语言，震慑了摇摇欲坠的清皇朝。后他以暴力革命谋刺清廷摄政王被捕，狱中所作“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句更为传诵一时。

辛亥革命胜利他出狱后，常在孙中山左右赞助一切，颇为倚重，孙中山临终前他还代为起草《遗嘱》。

汪精卫在北伐战争初的武汉时期，以全力支持国共合作，被尊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他公开提出：“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尔后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员时，他也突然掉转枪口，实行“分共”，与工农群众为敌。在社会极度动荡的新军阀混战时期，汪精卫为了争取权力，周旋于各方实力派之间，朝秦暮楚、乍离乍合，使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当“八一三”事变后，全民抗日运动掀起，当时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曾在群众大会上高喊“焦土抗日！”曾几何时，延于1938年底，终于公开叛国投敌，成为日本傀儡政府中的首脑，直至病死日本，沦为千古民族罪人。

陈公博在汪伪政权中，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卖国巨奸。他早年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受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建立起深厚感情，“一大”回去到达广州后，就不愿投入炽烈的工人运动中去，很快就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一心去美

5624/21
国留学。1925年他回国与汪精卫结识后，臭味相投，沆瀣一气，随汪政治浮沉，为国民党改组派中的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中，时在成都的陈公博，虽然不是“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参与同日本的勾结活动，正如他自己所说：“假使汪先生不倡导和平，我决不会离开重庆的，而且自己也曾决定非抗战到底不离开四川的。”武汉沦落后，汪精卫、周佛海通过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本秘密接触的内幕，当时陈公博并不知晓，尔后汪精卫召集心腹秘密商议并作出叛逃的具体决定时，陈即决然相随逃跑，另立南京汪伪政府。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不治病死，以后由陈公博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一直维持到伪政府的覆亡。

抗战后期，尽管陈公博也自知前景不妙，曾主动与重庆当局建立秘密联系，不断向蒋介石献谋划策，要他采取防共措施，可是始终未能得到重庆方面的委任。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和汪伪政府相继宣布解散后，这时陈公博已深感自己性命难保，在取得日军总司令部的帮助下，于8月25日乘日军运输机潜逃日本。不久，国民政府当局在群众一致要求惩办汉奸的舆论压力下，终于迫使日本政府将陈公博引渡回国，受审伏法。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中虽名列第三号人物，其实他是汪精卫叛国集团的最大帮凶。他自小薄有才华，而个人野心极大，早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以不愿为革命而牺牲个人“前途”，便断然和共产主义决裂，钻进国民党右派行列，蒋介石赏识其“才能”，引为心腹幕僚。后又为汪精卫引为同调，音声相随。他在抗战初期组织“低调俱乐部”，主张对日妥协投降，暗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和平”条件，1938年12月，周佛海终于随汪精卫秘密投敌，筹组伪

政府。

抗战胜利后，大小汉奸均锒铛入狱，接受审判和惩处，独周佛海却逍遥法外，送到重庆保护起来，后以民愤难平，予以公审，判之死刑，最后当局还以特赦名义改判无期徒刑。当时社会舆论纷纷，困惑不解：等而下之的大小汉奸均已先后伏法，何以罪大恶极的周佛海独能免除死刑？个中奥秘读本书后当能真相大白。

蔡德金教授是我国当代研究汪伪政权问题的专家，已发表有关论著十数种，现在他应我们编辑部所请，在已有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新发现的资料，编撰成本书。我们认为，有关汪伪政权人物的史料，近年来虽然时见披露，但大都片断琐碎，不够系统完整，而本书却能弥补这一缺陷，读者不仅可了解伪政府成立至覆灭前后经过，而且对这三个近代史上的历史人物的家庭历史及其本人的思想演变过程，都能一览无遗。

古人说得好：“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读者倘能从本书获得一些启示的话，那么，也是编者的区区奉献之意了。

目 录

汪精卫 (1)

陈公博 (97)

周佛海 (179)

汪 精 卫

书香门第 反清斗士

汪精卫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其祖自元末明清以来，世代为官，明朝成化年间，官位做到兵部郎中。嘉靖初年时，其祖应铨，字青湖，官位为提学金事。曾祖父名玠，官位不高，但博学能文，著有《史忆》一卷。祖父名云，字缙亭，中过举人，曾任浙江遂昌县训导官。有二子，长子，名淑，即汪精卫之父，次子名璟。兄弟二人从小遵从家教，寒窗苦读，虽未能功成名就，但继承父业，游幕四方。汪淑中年时游幕于广东番禺，入粤籍，始为广东人。汪璟晚年升至粤督幕，历任刘坤一、裕宽、张树声、曾国荃等督府幕僚，很有名望。并且，特以申韩术见称，兼工骈体文及诗词尺牍，著有《随山馆集》十八卷、《随山馆读简编》四卷、《无闻子》一卷、《松烟子录》六卷、《旅谈》五卷、《尺牍》一卷等著作，并藏有书数万卷。

汪父原娶浙江卢氏女为妻，生一男三女。汪生母吴氏，广东女，为其父续弦，生三男三女。他生于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1883年5月4日），年最小，排行第十。兄弟“兆”字排名，长兄兆镛、二兄兆炫、三兄兆钧，他则名兆铭，字季恂，号精卫。二

兄、三兄早亡。书香门第，文人世家，使兆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在他五岁时，即被送往书塾就读。他不仅每天要去书塾读书，放学回家后，还要在庭院中完成作业，就石凳练习大小字，读四书五经及其他名著。他后来在回忆童年时的学习情景说：“当我傍晚由书塾放学回家的时候，父亲必令我大声诵读王阳明传习录两三页，倾耳而听，又令我在一块白漆木板上写三四寸大的字，或陶诗、或陆放翁诗两三首，背手徐看，直至背颂得出，方才罢休，每有和作便令我笔记起来。”

在他十三、四岁时，母亲与父亲相继去世，年幼的汪兆铭随其长兄生活。兆镛长其二十二岁，博学能文，尤其擅长诗词，写有《微尚斋诗集》。长兄如其师长，常与之切磋诗法，使他受益匪浅。兆铭天资聪明，刻苦好学，加上严格的督教，所以很早就表现了写诗作赋，舞文弄墨的才能。1897年，14岁的兆铭随其长兄客居粤北乐昌，重九节游西石岩时，曾即兴赋诗一首：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歌中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茶羹枵腹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这首描写重阳节游山的小诗，很受时人的青睐。1909年，陈去病、柳亚子在苏州成立南社时，被收入《南社丛刊》诗文中。他在17岁时即充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家庭教师，并常往各书院应试，总以优异成绩而取胜。1904年春，新任广东学政朱祖谋主持院试，兆铭与其二兄同往应试，结果他获府案首。

自二十世纪初年，由于清政府提倡奖励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后，广州便掀起了留学热潮，尤其前往近邻的日本留学，更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时尚。广东濒临南海，广州又是岭南重镇，经济文化发达，自然易得海外风气之先。1904年9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仰承风旨，在广州举行选派赴日留学生考试，招考的学校是

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定额50名，汪兆铭与朱执信、胡展堂、古应芬、李文范等一批知名秀才，前往应试，结果同被录取。不久，兆铭即与朱执信等乘轮赴日入学，到东京后，住进了神田保町区清水馆寄宿生宿舍。速成科的学制是一年半，由于他学习刻苦，经过两个月的日语练习，已能懂得教科书的大概意思。1906年底结业时，他在全班62人中、在全校300余同学中，均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得毕业证书。此后，他放弃了回国获得清政府给予职务的机会，考取了法政大学专科，继续留在日本学习。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民主、自由的思潮方兴未艾，给予中国留学生以极大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觉悟与团结。1905年7月，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第二次抵达日本之时，民主革命派便以其为首领，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一统一的革命组织，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派反对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汪兆铭是中国同盟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以自己的组织才能，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孙中山和革命派的注意与青睐，不仅被提名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而且被推任为同盟会评议部的主任，被聘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在《民报》创刊之前，君主立宪党人梁启超等人办的《新民丛刊》极力鼓吹改良主义，宣传“开明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政治革命。由于汪精卫文字浅显畅通，在留日学生以至国内知识分子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民报》的重要任务，就是从理论上驳斥立宪党人的改良主义，宣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

《民报》从1905年11月26日发行第一期起，至1910年2月最后停刊，共计发行26期，其间由汪兆铭任主笔的共计15期。他以精卫、扑满、枝头抱香者、守约、民意（与胡展堂合署）等笔

名，先后发表《民族的国民》、《革命横议》、《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杂驳〈新民丛报〉第12号》、《斥为满洲辩护者之无耻》、《论革命之趋势》等30余篇（包括续文）。他以浅显易懂的文字，犀利的笔锋，生动有力的事实，痛斥了立宪党人的种种谬论，揭露其保皇派的真面目，成为同盟会的重要理论家，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代言人。

在《民报》第一期上，他以“精卫”笔名发表的《民族的国民》一文，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指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国民有国法上之人格者。作为个人，则独立自由，无所服从，个人对于国家，以一部对于全部，而有权利义务。指出清政府之所以鼓吹君主立宪，其目的仍不外乎巩固政治上之势力。

《希望满洲立宪者盍听诸》一文，针对《新民丛报》第四号刊载的《争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反对革命的谬论。指出：君主立宪之后，是不可争民权、得自由、得平等的。文章将日本的君主制与美国的民主制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说，以主张建立美国式的民权国之大统领，与君权国之君主相较，其宜不侔也。日本君权之重，几同专制，何况清政府连日本式的立宪也不可能做到。为此，必先争取民权，而后才能制定符合民意的宪法。在《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等文章中，指出了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之所以有遭受外国列强瓜分的危险，是由于满清政府统治的结果；只有排满以求自立，才能弥瓜分之祸。至于革命之目的，在于建立“民族的国家”，实现“民主立宪政体”，发展“国家民生主义”等等。

正如时人所指出的，《民报》的文字，以“精卫”的文章尤为

当时读者所爱好”。孙中山论及汪的文章时，盛赞其文字精深透彻，影响之广大。指出：“自精卫先生《民报》第6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说，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由此，汪精卫的大名闻名遐迩，他也因此而受到孙中山的信赖和世人的崇敬，很快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的活动及《民报》所宣传的革命主张，使清政府深为恐惧。1907年3月4日，日本政府根据清政府的旨意，“礼送”孙中山出境。精卫偕胡展堂(笔名汉民)等人随孙中山离开日本，4月间，经香港、海防、抵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在什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南部各省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其计划是先取广东，次取广西、云南，占领南部七省，然后北出长江，夺取全国政权。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特派汪精卫前往南洋各地，在华侨中建立同盟会组织，发动华侨捐款，以供武装起义之需。

从1907年夏起，汪精卫奔走于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仰光、暹罗、槟榔屿、霹雳等地，进行募捐军需与组织同盟会分会的工作。在新加坡创办了《中兴日报》，宣传革命，同保皇党人区渠甲等把持的《南洋总汇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他先后发表了《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发动革命之决心》、《论革命之激烈主义》、《革命与外交问题》等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保皇党人的改良主义观点，极大地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

汪精卫除注意文字的宣传外，还到各地对华侨进行直接的口头宣传。1908年1月11日和3月13日，《中兴日报》社两次在新加坡召开大型群众集会，每次参加者达数千人。汪精卫是这两次集会的主讲人，分别做了题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的演讲。他善于辞令，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他既能旁征博引，

借古喻今，又能分析入微，论证严谨，透彻明晰，引人入胜。他在檳榔嶼三山俱乐部的一次演说中，针对当地华侨多系福建人的特点，做了题为《闽侨尤应热忱地赞助革命》的讲演，以郑成功抵抗清兵入关的故事，激励华侨支持革命。1908年8月5日，他在星洲书报社演说《革命与民族主义》，抨击保皇派的改良主义，演说完后，当主持人向听众发出“有没有疑问”的提问时，没有人回答；当问及“有没有反对？”也没有回答。最后他宣布赞成者举手时，四百人皆起身举手，一时欢声雷动。新加坡同盟会分会负责人张永福回忆说：在汪演说时，演讲者尚未登台，会场即无虚席，当彼登上讲台，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讲到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其能吸引听众之注意力与唤起热情，概可想见。有人甚至评论其讲演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的信仰。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

暗杀遭逮 竭诚和议

自1907年至1909年初，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结果都接连失败，保皇党人曾借机对革命党人大肆攻击。为此，汪精卫在《中兴日报》发表《发动革命之决心》，予以回击。在驳斥了保皇派的种种污蔑之后，指出：各次起义连遭失败，绝不足证革命之不可行。其实在中外历史上，遭遇挫折，常常是任何革命必经过的初步阶段，难道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不是在经历多年的挫折与百练之后，最后才告成功？何况革命党人在经历过这次的经验之后，将为下一步的行动吸收无数的宝贵教训。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不畏强敌，不因暂时的失败而气馁，坚持斗争的决心。

在孙中山离日前后，同盟会上层中在关于如何发动革命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章炳麟等人利用孙中山曾接受日本人的捐款等具体问题，大肆攻击孙中山，武装起义的失败，更加深